



问题·探索·艰难的选择

十字路口上

的中国

邹东涛 崔金宏 著

兰州大学出



十字路口上的中国

——问题·探索·艰难的选择

邹东涛 崔全宏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8号

兰州新华彩印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插页：2页 字数：298千字 印数：1—8000册

兰州新华彩印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125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插页：2页 字数：298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7-311-30484-5/G·175 定价：7.60元

内 容 提 要

既然走到十字路口，就面临选择，选一条正确的路。人，是这样，一个国家更应该是这样。

中国，在经济上背着沉重的负荷，艰难跋涉着。它能够甩掉贫困，实现腾飞吗？究竟是什么粘住了它的翅膀？它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强国之路呢？

这本书，会帮你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它就长期以来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新观点。例举真实典型，语言质朴生动。

读者一定知道《山坳上的中国》，那么，本书就是其别一番特色的姊妹篇，不可不读。

关心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朋友，请你打开《十字路口上的中国》！

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在当前，改革开放的胆子应该再大一点，改革开放的步伐，可以再快一点，这样，经济发展的步子可能更快一些。

——《人民日报》1992年4月24日

当今世界分为快速经济和慢速经济两个部分，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规则——最快速者得生存。

——托夫勒：《权力转移；处在二十一世纪边的知识、财富和暴力》

谨以此书献给真正关注和探索中国经济腾飞的人们。

作者真诚渴望本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能够转变为推动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的力量。

序

樊 纲

邹东涛、崔全宏同志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向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挑战”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他们实际上还向另一些居“主流”的观念和作法提出了挑战：第一，邹东涛请我这个比他年轻、而资历浅的“后生”作序；第二，就他们在书中所挑战的那种观点论，我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那个“主流”，也就是说，他们在请他们的理论“对立者”作序。钦佩之余，只有从命了。

一、来自“疲软”现实的呐喊

全书第一小节的标题是：“短缺疲软——中国经济的两个怪胎”。我事先未与邹东涛同志就他们这本书的见解作过讨论，对他们构思写作此书的全过程了解不多。但从“疲软”这一“新词”的使用以及从书中所引用的资料来看，他们是在1989年中国经济进入“疲软期”之后着手此书写作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疲软时期”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是项目下马、停工

停产、产品积压、生产力闲置、增长率下降，工人待业、农工回乡，有劲用不上。问题还在于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并不完全陌生。从当前经济问题出发，作者又追溯到以往，对建国40多年来的历次“调整”、“滑坡”进行了一番回顾，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波动性大大高于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不稳定系数”比日、德、美、前苏、英、法分别高出8—5倍；“十次经济大滑坡”就相当于损失了“1986年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经济学家，面对我们这样一个穷国的宝贵的社会生产力的这种浪费，怎能不痛心疾首。本书的作者则更不满足于痛心疾首，而是要批判，要呐喊。批判的对象便是作者认为在中国居“主流”的“低速增长的保守战略”，为之呐喊的便是高速增长战略。这可以说便是本书鲜明的主题。

这样一本书，这样一个主题的出现，应该说不是偶然的，既不是学者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的结果，也不是一味追求标新立异的产物，这是理论对现实的反映，是对经济“疲软”现象的痛切感触。直到见到此书书稿，我才突然意识到：“过热增长”一定会以紧缩调整的“强冷期”为终结（这已经是“主流派”观点了），但以往我们有了那么多分析“过热增长”的论著，反映过热时期的现实，迄今却未见到一本专门分析“强冷期”的专著。退一步说，无论我们怎么理解“过热”与“强冷”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经济出现了许多波动，是个人人都承认的现实，而“高峰”和“低谷”是构成波动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阶段，我们过去却只注意了对高峰期“短缺”现象的分析，而忽视了对低谷期“疲软”问题的研究。无论如何这本书在这方面具有开辟先河的功绩，“填补了一个空白。”

二、究竟为什么会有“紧缩”

在经济紧缩期内，会造成社会生产能力的浪费与闲置。那么，这种损失与闲置到底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一种回答应归罪于最初的总需求膨胀和经济过热。紧缩期的一切损失，都是过热增长、结构失调的全部社会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的现行经济体制内部缺乏稳定机制和经济效率低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不搞紧缩、调整，就无法使经济恢复平衡；不付出紧缩期中付出的那些成本，经济就无法更好地增长，因而从长期来说还是合算的。

另一种回答是应归罪于紧缩政策本身，认为从来没有“过热”，也就根本不该有紧缩，经济过热是好事，应该热下去，冷是最要不得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人为的浪费和闲置。

本书作者显然持后一种看法，而笔者本人更倾向前一种回答。但我想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愿望，就是把问题本身明确提出来以期引起更深入、更广泛的讨论，而不是急于下一个定论。这是因为，经济学的问题都无法在实验室中靠重复试验来证实或证伪，而只能靠广泛、深入的讨论和争论来加深对实践的认识。比如，我们无法用实验的办法回答：如果当年“大跃进”一直搞下去，没有调整、紧缩，会是什么样子；或者，如果1988年底以后不搞治理整顿，我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多少；从长远看，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会更多还是会更少，现在的通货膨胀率

是多少，市场状况如何等等。这并不是说经济学中的问题是不能有结论的，而是说我们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下定论，而是宁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从更多的方面来探讨，多分析几种可能性。

对上述问题作出正确回答的重要性，就在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在实践中采取怎样的对策：如果一切问题根源于最初的过热，相应的对策便是防止总需求膨胀？若认为一切损失根源于紧缩政策本身，相应的对策便是“永远不搞紧缩”，“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学问题的这种实践性，要求我们在思考问题时也更加实际一些，更注重运用实证的方法：不仅用实证的方法去分析各种经济问题，也用实证的方法去分析决策过程本身。在此，我想再次强调一下“紧缩政策”的实际形成过程。紧缩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在实际中往往并不是基于什么战略或者什么原则（“教条”），而是出于“形势所迫”，是现实中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逼出来的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每一次这个“决心”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经济学家或少数决策人观念的产物，而是上上下下“呼声”、“牢骚”、“指责”的结果，包括人们以实际行动来表现不满情绪（如“抢购”）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经济学家认为是否发生了“过热”，只要各级政府官员、各部门首脑、各企业经理、工人、消费者等大家都认为现状不能再维持下去（当然是每个人都说别人不能再如此这般下去），非得采取点什么措施整顿整顿，调整调整，紧缩政策就必然出台，冷却时期就必然出现。即便我们不把紧缩前的状态称作“过热”，那也总是经济生活出了毛病；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能用继续膨胀、继续高速增长的办法来医治这种毛病，而是要搞紧缩，那么，即使不称过去的那种状态为“过热”，也还是会有“冷却”。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只能跟在实际工作者的后面概括他们的感受和看法

而不能提供指导性意见，我想说的只是，当我们评价一项政策和一种措施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到它形成时所面临的客观形势，看到它所针对的现实问题。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是各种行为主体、各种利益集团的活动，脱离了他们在一定形势下所面临的问题和所作出的选择，经济理论就会误入歧途，也就不再能解释经济现象，指导经济政策。

三、政府的发展战略为什么越来越“保守”

我们不仅应该用实证的方法来分析紧缩政策的形成过程，也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发展战略”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本书作者不仅批判了紧缩政策，而且进一步将之归结为“保守的低速增长战略”，并认为应该恢复50年代时采取的高增长战略。但是，作者似乎忽视了一个应该提出并予以分析的重要问题：政府为什么会犯“恐高症”？为什么它先是采取了高增长战略，后来却“错误地”采取了低增长战略？战略选择上越来越趋于“保守”，目标订得越来越低？

难道这是由于“主流派经济学家”用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影响决策人的结果吗？这倒有点“高抬”了经济学家们的作用。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不能说经济学家完全不起作用，但其实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那么政府决策部门本身具有怎样的“战略取向”呢？就笔者猜想，没有一个政府是不想有“高速度”的。即使后来制定了“低速度”战略（公平而论，没有谁真的说“低”速度，而都是

说“适度增长”，只不过这个“适度”相对于人们所希望的那种“高速度”要低罢了），如果速度高了，政府也还是作为“政绩”来宣扬的，口头上不“宣扬”，心里也暗暗自喜。60年代以前，公开提倡的是高速度，但后来口号却越提越低，“目标速度”从50年代的“超英赶美”，逐步降至80年代的7—8%，然后又降至90年代的5—6%。因此，我们实际上要解释的问题不是政府为什么采取了低增长战略，而是为什么政府所采取的“战略”，由高增长逐步变成了低增长，而且日趋降低？

这当中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中央决策者在历次的经验中逐步认识到，由于在我们的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和国营企业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高速度”的口子一开，往往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中央计划若实行“高投资”，“打满”计划盘子，下面还会层层加码；若事先估计到了下面的“加码”，上面就不能满打满算（这也算是一种“理性预期”行为），于是经济计划就从早期的“积极平衡”，演变到后来的“留有余地”。不仅计划盘子不能打满，人们还发现口号也不能叫得过响，目标不能订得太高，这不仅是因为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总会以“超额完成任务”来表现自己的功绩（在我们的“考核体系”下，产值、数量一直是被视为首要指标），而且还是因为高的目标速度会为各地方、各部门争抢资源、多放贷款和只顾短期扩大生产规模，忽视“内涵式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借口。此外，上面一提高速度，下面争相以“超高速度”来“做贡献”，还会引起虚报、浮夸，“卫星”放得一个比一个高，最后弄得上面连下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那才叫真正的“失控”。

上上下下都“大于快上”，结果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可以给生产者以压力，压着他们多生产，计划者也可以利用短缺的

压力督促企业加班加点。但反过来说，政府也面临短缺的压力；企业正好利用短缺向上面施加压力让其进一步拨款以扩大生产，财政状况将更加窘迫。这还好说，地方、部门、企业的头头脑脑还都是政府官员，不给他们拨款，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不那么好说话的是“老百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结果要么是短缺，要么是通货膨胀，这都会引起消费者的不满，这才是政府所“忌讳”的事。企业家们乐于利用“涨价盈利规律”^①，政治家们则绝不会这样做。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政府可以用“号召”或“加强思想教育”的办法使老百姓们在“不骂娘”的条件下，它才敢“利用”这一“规律。”

除了短缺和通货膨胀，追求眼前的高速度还会造成结构失调，结果到头来还得由中央出面进行调整。要调整，就要关停并转，失业增加，资源浪费，生产力闲置，又会产生新的社会摩擦，加剧经济的不稳定和社会的不安定。

经过这么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中央决策者们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心有余悸”，也就只能越来越小心谨慎，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觉得不如“稳健”一些；“不怕慢，就怕站”，不如用低速度来换取稳定。于是，政府的“战略”逐步从“高速”降为“低速”，由“积极”趋于“保守”。

^①顺便指出，如果大家都“涨价盈利”，到头来只是通货膨胀，而谁也不会盈利。除非不给消费者加工资，也不怕他们“骂娘”。就是说，只有在所有企业都不给工人加工资的条件下，“涨价盈利”规律才起作用，但说到底，这是从消费者那里挖了一块。

四、问题不在“战略”而在“体制”

以上的种种讨论，都把我们逐步引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政策或战略所得以形成的那种特殊的环境和形势上来，再进一步，特殊的环境和形势所赖以形成的那种特殊的体制条件上来。

经济学家们的长处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具有经济效率的，什么是缺乏经济效率的，但他们却经常忽视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一个经济能取得怎样的效率水平，或者反过来，会发生哪些效率损失，是受一定的经济体制环境所制约的。“理想状态”或“最优状态”是一回事，现实世界特定体制下不可避免的状态，是另一回事。就政策或战略而言，不是政策或战略决定体制，而是在一定体制下，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定的政策和战略。就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如果不是由于在我们的现行体制下，一提倡“高速度”就出现“一窝蜂”地大干快上，导致短缺和通货膨胀，就不会产生紧缩与调整的要求，也不会出现“保守的”增长战略。反过来看，在西方一些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从来是提倡“高速度”，鼓励高消费、多投资，“节俭”都成了经济学家批判的一种罪过，却还是低速度、高失业。可见，关键的问题（不是唯一的问题）在于经济体制，而不在于经济增长战略。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不在于我们是否应有一个高增长战略，而在于在我们这个体制下为什么一提倡高增长就要出乱子。

本书作者强调“刺激生产就是一切”，为了这个目的，就要设法创造需求，创造销路、“制造资金”，发挥金钱的“启动作

用”等等。这些作为一般原理是不错，但要放在怎样的具体的体制条件下。需求能创造供给，供给也会创造需求，这是早年“萨伊定律”中提出的原理；后来这一原理又体现在“瓦尔拉斯定律”中，瓦尔拉斯定律的成立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条，每个人的支出都不超出其真实收入——也就是说，经济中的每一行为主体的“预算约束”都是“硬”的，第二条，储蓄者和投资者不发生分离。公有制经济之所以容易出现“短缺”，则正是由于第一个条件受到了破坏——在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大量的“预算软约束”的经济行为主体，支出不受真实收入的局限，亏损企业可以照样高消费高投资，又怎么可能有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呢？

单就总供求平衡而言，当然不是追求绝对的平衡。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那样，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生产能力，减少失业，哪怕略有些通货膨胀，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是如果某种体制条件下，需求与供给是“脱节”的，短缺因种种原因不能引起供给的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相反，短缺只是引起“滞存”和粗制滥造，它就不但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反而有害。

再看资金供给问题。资金短缺，导致坐失赢利机会，当然是坏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资金的作用就在于润滑流通，“启动增长”，捕捉新的赢利机会，也就是增长的机会。但是，如果资金的增长只是为了给亏损企业补窟窿，维持其生存，甚至使其在亏损的同时还能再涨工资，再增办集团消费，再增加没有销路的过时产品的生产，又怎么能有经济增长呢？从另一个角度看，资金作为一种购买手段，也是资源分配的一种手段。如果资源总量是给定的，而大家都通过增加资金供给（扩大信贷规模）

的办法去争抢资源，其结果并不能使资源增多，而只能把物价抬上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获得资源，往往不取决于谁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而在于谁更有本事争得资金，争得贷款，结果往往会加剧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本书的作者通过多方面的分析，充分展示了我们的经济中蕴藏的巨大的增长潜力，又揭示了以往各次大起大落特别是各次“滑坡”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而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现行经济体制对于这些潜力的充分发挥所造成的限制，从而恰恰说明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书中许多地方都指出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以及体制改革与经济腾飞的相关关系，而这正是我读出的本书的最积极的主题。

五、经济的腾飞与经济理论的腾飞

这篇“序”可以说是我读此书的一点体会。它或许与本书的观点不完全相同，但我想“差异”本身或许有益于展开对问题的讨论。不过，到此我倒想总结一下笔者自己与书中所批判的“主流派观点”的差异，这主要在于：笔者并不认为“低速战略”或“适度战略”就能解决我们经济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就能避免经济波动和提高经济效率，就象笔者不认为“高速增长战略”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样。其原因正是上一小节所说的：我们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战略，而在于体制。

经济现象是复杂的，经济腾飞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每个经济学家都担负着说明经济问题，探索腾飞道路的任务。面对这一